

• 其他 •

藏文翻译在传播佛教文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多尚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北京 100080)

[摘要] 藏文翻译在传播外来知识,尤其是佛教文化,以及构建具有高原特色的藏族文化方面,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藏文翻译为祖国文化增加了许多新元素,丰富了语言和词汇,推动了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促进了文学发展。

[关键词] 藏文翻译; 佛教文化; 地位; 作用

[中图分类号] G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178(2011)06-0118-05

引言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令社会、文化和知识结构都产生巨大变化,终于使人们的行为规范、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系统面貌一新。由于知识的传递主要依赖语言这一交际工具,于是翻译就成为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

藏文翻译,是藏民族学习异域文化的依托,沟通信息的桥梁,承载文化的舟楫。它为传播佛教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本文就藏文翻译在传播佛教文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为叙述方便,本文仅以吐蕃时期的藏文翻译为例),望读者赐教。

藏文翻译的起源

藏文翻译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了传译。这是很自然的。这是因为“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和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1]只不过那时藏族尚无文字,人们相互交流

只凭语言或信物来表情达意。更准确些说,在藏文问世之前,无论藏王和来访的天竺鸿儒之间的沟通,还是吞米桑布扎与李敬之间的交流,都是借助于语言(即所谓的口译)这一交流工具,表达彼此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翻译。

到了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松赞干布深深感到“为了适应浅慧众生的观感起见,而想到要掌握王朝的政治和施行正大的法令,非有具备一切功德之本的文字不可。”^[2]于是他派遣心腹大臣吞米桑布扎,连同仆人等,前往印度寻求学术界权威导师,学习文字。吞米桑布扎翻越崇山峻岭,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南印度,遍访名师,广搜文疏,浏览涉猎,学习梵文,游学整整7个春秋,学识大增,最后终于学成回国。吞米桑布扎一回到吐蕃,求贤若渴的藏王松赞干布就立即委托他创制藏文。吞米桑布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潜心研究,参照梵文,并结合藏语实际,创造性地将印度梵文50个声母改造为藏文30个声母,设计出藏文字母、拼音方案和各种字间符号。这就是由30个藏文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组成的可以表达各种概念的实词和虚词。

藏文字的创立为提高广大藏族群众的文化知

[收稿日期] 2011-06-23

[作者简介] 马多尚(1955-),男(藏族),青海乐都人,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民族语文翻译理论。

识打开了通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藏文日趋成熟,成为统一的拼音书面语,使藏民族各种文化知识得以记载和流传,从而成为藏民族在文化上统一的纽带,为发展藏族文化,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文字,使大量佛教经典被译成藏文,在藏区广泛流传,同时历代藏族学者用藏文撰写了有关历史、传记、哲学、医学、艺术、法律、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使藏族医学、艺术、文学、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得以发展。

据有关史料记载,吞米桑布扎在拉萨北郊帕蚌卡完成创制藏文,并著8部论。在吞米桑布扎将这些成果奉献给藏王时,作了第一首藏文体诗。接着,就开始翻译佛经《宝云经》、《白莲经》等佛经。以此为滥觞,开始了藏文翻译的新纪元。

由此可见,藏文一问世,就担负起著书立说和译介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重任,为构建藏族灿烂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主要译师及翻译方法

在藏族历史上,由于“七觉士”的出家 and 桑耶寺的建立,藏族社会的僧人队伍和庙宇不断壮大起来,培养了“知识分子”,训练了译经队伍。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仅吐蕃时期,先后参加佛经文献翻译的门徒逾千人,达者有百位。比如,前弘期的领军人物有:吞米桑布扎、寂护、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狮子、尚帕桑、玛哈热咱、摩诃衍、哈热纳波、毗卢遮那、阿难陀、伽罗、丹玛泽芒、聂古玛诺、玛仁钦乔、昆鲁益旺布、噶瓦白泽、觉若鲁益坚赞、尚耶喜德、聂·鸠摩罗等。后弘期的杰出代表是:仁钦桑布、嘉宗珠僧格、次成加瓦、志和角西热、努贤巴华桑、桑盖普华西热、巴才次成、仁青扎、扎巴坚参、兰达玛洛哲、吉角达伟窝色、吉江伍盖、觉囊更噶宁布、玛尔巴、桂匈努贝、额勒贝喜饶、额洛丹喜饶、达仓喜饶仁钦、热多杰扎、更登群培等。这些译界名宿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翻译了不胜枚举的佛教文献,为吐蕃王朝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藏族传统文化发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方法是完成任务的桥和船。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积累、翻译实践和训练,藏语文也得到了发展,规定了经典翻译的方法,赞普下令厘定文字,规定了佛经翻译和审定的三大原则,即:(1)符合

声明学(语言学);(2)符合佛教经义;(3)使吐蕃人容易理解。这三条原则是对从松赞干布至赤松德赞时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要求译文通顺流畅、“信”“达”兼顾、通俗易懂。同时又规定了音译、意译、直译、改译等四种翻译方法。与此同时,针对当时译界出现的混乱状况,还特意规定了四点注意事项,即:(1)翻译佛、菩萨、声闻部等的名词时,根据其职位和功德,采用不同的敬辞来翻译;(2)对已厘定成规的译语不得随意更改;(3)各译场制定的新译语,必须符合声明学原理,同时还须报送堪布和大译师,经堪布和大译师审定后,最后报呈赞普颁行,不得自行其是;(4)密宗经咒,未经赞普降旨同意,不准自作主张,随意翻译。除了上述原则和方法外,还对语序、多义词、同义词、数词等的具体翻译方法,也作了明确规定。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译师们遵照上述翻译原则,灵活运用意译、音译、直译、改译等翻译方法。宜意译则意译,宜音译则音译,宜直译则直译,宜改译则改译。四种方法灵活运用,相得益彰,各展其长。其具体翻译过程在桑耶寺的壁画中有形象的描述:译者盘腿相向而坐,第一人高声朗诵经文,第二人口头译成藏文,第三人(位高权重的高僧)负责审定译文。然后,由一位年轻僧人将译文用竹笔写在长条纸上。年轻僧人写毕交给“中校订者”对此进行一次校对,主要是对文字的校勘核对。最后由“大校订者”对照原文,从字音、词义、语法、格式、结构等方面作最终的校订。至此,才算完成了一本经书的翻译过程。凡未经过上述诸道工序的经书,一律不准在社会上流传和传播。这些严谨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再辅以译师们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译风译德,使翻译水准大为提高,所译经典译笔严谨,辞旨文雅,质量上乘,成果丰硕。

翻译的主要佛教文献

据大量藏汉史料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始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佛教一传入就开始了佛教文献的翻译。首先由藏族大译师吞米桑布扎翻译了拉托脱日年赞时期获得的《宝云经》、《宝篋经》、《月灯》等。此后,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下,才华横溢的翻译大师们潜心译注,反复辩难,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陆续翻译了大量的佛教

文献。诸如《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千手千眼观世音陀罗经》、《遗教广记》、《莲花藏》、《十一面观音经》、《十一面观音陀罗尼》、《不空绢索经》、《因滴论》、《善恶因果经》、《俱舍论》、《稻秆经论》、《贤愚因缘经》、《无量寿宗要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解深密经疏》等显密经。另据敦煌写卷佛经目录记载,汉、藏对照的对译佛经名称有 88 部之多。这些主要佛教文献的翻译,对佛教文化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翻译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 6 至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印度,两汉之际经由西域逐渐传入中原内地。东汉明帝时,遣使求法归来,在京师洛阳营造白马寺。白马寺初为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住所,二人在此译出现存第一部汉译佛典《四十二章经》。东汉末年,西域僧人安世高在洛阳译经 175 部,计百余万言。大月氏支娄迦谶也翻译了多部大乘佛经。从此,开始了佛教在中国的流传。

佛教传入吐蕃大约是在公元 7 世纪松赞干布时期,起初它是从唐朝输入,后来又直接从天竺翻译佛经。佛教真正在吐蕃站稳脚跟是在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公元 761 年赤松德赞从邬仗那请来了密宗大师莲花生,莲花生用法术战胜了本教等地方旧势力的阻挠,为吐蕃正式建立佛教扫清了障碍。接着,赞普根据高僧们的建议修建了规模宏大、功能完善的桑耶寺,该寺主殿上、中、下三层分别采用了藏、汉、印三地的建筑风格,反映了三种文化的结合。组织可造青年在此学习梵文,与外来的高僧合作大量地翻译了佛教经论,建立了法宝。还度僧出家,成立僧团,建立了僧宝,标志着三宝俱全,佛教在吐蕃就正式建立起来并开始广为传播。

到了元代,藏传佛教呈现出空前传播的态势。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人员往来日趋频繁,从八思巴开始,终元一代共有十多位萨迦派高僧相继被尊为“帝师”,西藏僧人大批进入内地,京城及其他地方广造寺院佛塔。佛塔既是建筑艺术,又是雕塑艺术,是集两种艺术于一体的佛教建筑物。我国佛塔的建筑,其分布之广、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层级之高、造型之美,在古代建筑中是首屈一指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北京北海公园琼华岛白塔山上即建有一座藏式白塔,秀丽端庄,与西城

妙应寺(俗称白塔寺,始建于元代,原名大圣寿万安寺,寺内的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藏式佛塔)遥相呼应。现在保存完好又比较著名的元代藏传佛教建筑,还有居庸关过街塔、潭柘寺塔和碧云寺等等,明、清以后的建筑就更多了。这些佛塔犹如一颗颗璀璨的宝石,一朵朵绚丽多姿的奇葩,点缀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之间,为祖国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它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

藏传佛教造像,大多以印度佛教艺术为母范,往往直接取法于古印度佛教图像,印度气息甚浓。其造像躯干颀长,肌肤丰润,比例匀称,形貌典丽,垂眸微笑,文雅敦厚,富于人情味。藏传佛教及其造像艺术在内地较有规模的传播始于西夏王朝,元朝推而广之,向南直达广东潮州。而位于浙江杭州灵隐寺的飞来峰,恰似藏传佛教飞地,至今保存完好的元代石刻造像群,计有六十八龛上百尊,构成飞来峰造像的主体与精华。其中近半为藏式风格,另一半汉传样式中,也糅杂了藏式,或说是互有影响,被认为是汉藏艺术的结晶,为祖国的江南带来一抹异域的风采。

佛教雕塑对我国传统雕塑的影响也很大。在内容上以表现人和动物为主题,变为着重表现佛、菩萨的宗教信仰崇拜;在技巧上由简朴直发展到了精巧圆熟;在风格上由雄伟、挺拔转为庄严、富丽。佛教雕塑虽然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但就艺术而言,它毕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

翻译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中华文化是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即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进程。

佛教文化传入我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对我国社会影响最深的文化交流之一。各民族的翻译大师们在翻译佛教文献的过程中,交流双方学术成就,沟通彼此学术传统,为相互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途径。譬如吐蕃时期,由于藏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具有藏民族特色的藏文化已经形成,藏、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便捷和频繁。

据吐蕃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蕃带进了360部佛经、60部工艺著作、60部医书、80部占筮历算书,以及食物制作法书籍、农业耕作法书籍和字典、词典等等。这些佛教经典和重要著作被译成藏文以后,不仅丰富了藏民族文化,而且进一步促进了藏汉文化交流。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持续不断地引进华风,文韬武略的松赞干布高瞻远瞩,不断“遣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借鉴先进的大唐文化,这对后来吐蕃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后来金成公主嫁给赤德祖赞,进一步加强了唐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友好往来。

两个公主带到吐蕃的大量的医学、历法等方面的书籍被译成藏文后,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对藏族医学和天文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文成公主入藏时把佛教经卷带进吐蕃,使之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源头之一。

汉文经典的藏译是中原汉文化影响吐蕃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就发现有《尚书》中的《泰誓》(中、下)及《牧誓》、《武成》4篇,《春秋后语》6篇,《孔子项托相问书》等先秦古籍。这些古籍的翻译,为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吐蕃从唐朝汲取文化营养还表现在音乐方面。据藏史记载,郁松芒布杰在位时,从唐朝获得了笛子、唢呐等乐器。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历来是双向的。在大唐文化传入吐蕃的同时,吐蕃文化也传到了内地。汉地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吐蕃及其他西域之地。绘画方面也吸收吐蕃等西域之地色彩、渲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涌现出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等一批兼收并蓄的绘画大师。对敦煌文献中记载的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汉藏对照词语》、《汉藏对照词汇》等的学习,促进了唐蕃双方文献、表疏及经典的翻译和交流。

吐蕃人“赭涂面为好”,即藏文之“赤面”。是吐蕃人的一种防寒护肤方法。传到大唐便流行作为一种化妆术,谓之“元和妆”。白居易《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起,髻椎面赭非华风”。吐蕃还为汉地输送药品,交流医学。吐蕃大医学家老

玉托云丹贡布曾亲自到四川地区行医,为汉族患者治病,把藏族医学传播到了汉地。

到了13世纪80年代,在元朝政府的主持下,吐蕃佛教文化方面的学者会同汉、畏兀儿等民族的学者,以萨迦寺收藏的藏文经典为主,用以与汉文佛经对勘。他们相互切磋、反复辩难,终于历时三年完成了这件规模宏大的典籍对勘盛举,在藏、汉文化交流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至于明、清以后的藏、汉交流就更频繁了。只不过,在文化交流中都各有吸收,各有扬弃,其优秀部分,则汇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

翻译丰富了祖国文化宝库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佛学泰斗赵朴初先生也说:“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这是的确的。然而,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佛教似乎就是迷信,完全抹杀了佛教文化在祖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事实上,佛教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广阔的范畴,包括了佛教的哲学、历史、文学、美学、艺术以及佛教的风俗等等各个方面。“佛教以它那充栋的经典和玄妙的思维,以它那雄伟壮观的寺庙和石窟建筑,以它那栩栩如生的菩萨雕像和乘云飘逸的飞天彩绘,以它那想象丰富的佛陀传奇和本生故事,汇合成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潮流”。^[3]正因为如此,各民族的贤者们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地把它翻译成本民族语言文字,广为传播,并使其发扬光大。

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佛教盛行,重要佛教经典陆续翻译成藏文。而且,译经严肃认真,重视程度不在汉文与巴利文佛经译本之下。有些佛经印度已经失传,汉文和巴利文亦无译本,藏译佛经经典中却保存了下来,为自己的母体注入了新的文化基因。而《因明学》、《中观论》、《入中论》、《量释论》等重要经典的翻译,丰富了祖国的哲学思想。因明脱胎于古印度逻辑学,以其重要的作用而跻身佛经五明之中(其他四明分别为:《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印度对通达五明的人冠以“班智达”的称号,足见佛教对五明的重视。因明学的最早翻译始于寂护,他和藏族学者法光译出了陈那的《因轮论》,此后,吐蕃时期三大译师中的吉祥积、知军和另外两个译

师空护、法光,共译出陈那、法称及其他人的因明学 19 种著作,其翻译数量之多,注释之详尽,传讲应用风气之浓,远远超过了汉地。佛教包含了许多理性的思想和哲学的内容,其中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哲学思想,与祖国哲学相得益彰,大放异彩。由译师白热杂纳等负责翻译编辑的梵藏对照词典《翻译名义集》,是藏族历史上第一部梵藏对照词典,对后世的佛经翻译和词典编纂影响巨大,是佛经翻译的重要工具书,也是词典编纂的重要蓝本。对研究古藏文和藏语语音演变历史,了解藏文翻译史,更好地从事翻译工作,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治疗 404 种疾病的药物、108 种民间验方和《医学大典》等被翻译成藏文后,藏、汉医学互为参照,彼此补充,对当时吐蕃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日后祖国医学事业的丰富、繁荣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佛教绘画艺术的传人同中国传统画法的结合与创新,使中国的绘画艺术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佛教壁画是佛教绘画中最为璀璨的一朵奇葩,到了唐代,壁画的发展可谓空前绝后,盛极一时,仅敦煌莫高窟保存的历代佛教壁画就达四万五千多米。规模之大、数量之众,绘画之精美,真是举世无双。总之,译师们通过佛书的翻译,把天竺和其他诸佛教国的大部分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了,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界。^[4]

需要指出的是,大师们翻译的这些佛教文献并非篇篇珠玑,更非说佛教文化全身是宝,它所有的东西都好。事实上,佛教文化也有它理论上不完善的地方,也有一些守旧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些封建糟粕。对此,我们要善于分析,正确对待。

结 语

佛教文献翻译,为祖国文化增加了许多新元素,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和词汇。仅翻译经典所新创的词汇和成语,便有上万条之多。这些词汇和成语,虽未必一一流行,但后世学人所获知的确实不少,显然成了祖国的新词汇和新成语,丰富了我国语言的表现力。

第二,推动了祖国语法及文体发展变化。由于佛典的文体具有浓厚的异域语调色彩,与我们的传统文体不同。翻译时译师们为确保质量,许多时候按原文直译,译多了也就学会了这种文体。譬如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这些特点为祖国文章构成形式开辟了新天地,有助于新文体的产生。

第三,促进了祖国文学的发展。从文学的角度看,许多佛教文献本身即是文字优美的上乘文学作品,或具有浓厚的文献色彩。如《大乘庄严经》等。这些佛典的翻译不仅推动了祖国新文学形式的产生,而且促进了祖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 [1] 季羡林. 谈翻译[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8.
- [2] 五世达赖喇嘛. 西藏王臣记[M]. (郭和卿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3: 21.
- [3] 李凭. 东方传统[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 [4] 范文澜. 中国通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Position and Role of Tibetan Translation in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of Buddhism

MA Duo-shang

(China Translation Center for Ethnic Languages,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Tibetan transl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isseminating foreign knowledge, especially culture of Buddhism and developing Tibetan culture with plateau characteristics. Tibetan translation has enriched the Chinese culture by adding new elements into language and lexicology,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grammar and style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Tibetan translation; culture of Buddhism; position; role

(责任编辑 葛小冲)